

正确理解《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

李良明

[摘要] 林育南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给陆若冰的九封信,反映了这一阶段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时下个别“玩文学”的人,不懂这段历史,把这九封信视为林育南“婚外恋”的证据而大肆渲染。纪实文学的殿堂应该是神圣的,任何玷污这块圣地的垃圾都必须清除干净。

[关键词] 林育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革命书简

[中图分类号]G25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5)03-0072-06

《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刊登了《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这是林育南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写给陆若冰女士的,它客观地记录了这段时期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然而,时下极个别“玩文学”的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和不理解这9封书简的真谛,便断章取义,把这9封书简视为林育南“婚外恋”的证据而大肆渲染。他们胡编乱造,无中生有,既丑化了先烈,给林育南烈士的脸上抹黑,又给陆若冰女士和林育南的亲属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必须予以澄清。

—

《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写于1930年12月15日至1931年1月10日。其时,林育南为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是1930年秋成立的,设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在于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各项事宜。在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等指导下,林育南主持苏准会秘书处草拟了《宪法》、《劳动法》、《土地法》和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肃反政策以及联合农民士兵群众的策略等决议草案,圆满地完成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之后,林育南遵照党的指示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原定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这9封书简,前5封写于去江西的途中,后4封写于上海,主要反映了反对李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斗争的情况。

林育南之所以给陆若冰写这9封书简,是与党的秘密斗争环境分不开的。他从1929年春到上海后,就一直秘密地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无论是负责筹备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还是参与领导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当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圆满完成,林育南于1930年12月初取道杭州,拟经衢州和赣东北苏区,进入中央苏区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紧锣密鼓,

加紧了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活动。林育南是一位党性很强的同志，他亲自经历了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深刻认识到“左”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因此，不能容忍“左”倾错误又来重新危害党，是坚决反对王明上台的。他的这一心情，当时既不能向党的组织写信表露，也不能向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写信表露，否则，就有暴露党的机关和同志、亲人的危险(他的妻子李林贞当时仍和几位同志住在苏准会机关里)。所以，他只好把自己的心迹向陆若冰袒露，写信告诉陆若冰。

陆若冰和林育南同是湖北省黄冈县(现黄州市)人，她是在林育南的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1922年春，陆若冰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从黄冈跑到武汉，由林育南介绍到恽代英、林育英(即张浩)等创办的武昌利群毛巾厂做工，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她在黄冈领导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后，她在黄冈遭到国民党悬赏通缉，于1928年初只身跑到上海，又通过林育南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党派她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秘密从事革命工作。林育南一直视她为亲妹妹一般。因此，林育南向陆若冰写信，既能通过陆若冰把自己的思想反映给党的组织，又比较安全可靠，这是不难理解的。

《林育南烈士书简(九件)》，完全是讲的党内斗争的大事，用语比较隐讳。林育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虽然信简中有少许“言情”之语，但绝不是“婚外恋”，而是为了掩护革命工作，以防止万一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而招惹麻烦。

二

大革命时期，林育南和李立三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在武汉并肩战斗，共同领导湖北和全国的工人运动，在1927年1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俩均被选为省总工会负责人，李立三任外交主任，林育南任宣传主任。在6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俩又都被选为全总执行委员，在全总第四届新执委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俩又同时当选为常委，常委分工，由林育南任秘书长，李立三为组织部长。因此，他俩当时都是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工人领袖。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看法的不同，他俩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1930年6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表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早在这年春天，就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作用。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刚刚露头，首先便遭到恽代英的抵制。林育南出于公心，也不同意李立三的观点。

这年3月20日至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特派员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因此提出，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路线及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地方暴动”，士兵运动的中心“是要坚决的组织兵变，反对逃跑主义。”

出席这次会议的林育南、张浩、张昆弟、罗章龙等，不赞成李立三的观点。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处在“资产阶级稳定时期”，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要到来”。在这种形势下，党的任务是利用合法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不应该组织那些毫无胜利希望的

“武装暴力和同盟罢工”；在组织政治罢工中要注意“肃清命令主义”和“纠正强迫罢工”。

林育南等人的意见，不仅没有被李立三所接受，反而遭到了批判。李立三在会上指责他们“右倾动摇”，“有右倾倾向”，并给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李立三甚至还说，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执行策略中的最大障碍是“右倾危险”，提出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个反右倾的斗争，“党内组织指导机关，要把右倾分(子)开(除)出去”。还说：“革命前途能否胜利，就要看能否战胜右倾的危险”¹。

嗣后，李立三更加神气起来，认为只要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组织工人“大干”一下，就必然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于是下令解散党、团、工会各级组织，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致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党在白区的工作也遭到极大破坏。

尽管林育南当时不可能阻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推行，但是，他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和职权范围内，却坚决进行了抵制。在李立三大搞所谓“暴动”时，林育南给时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的吴化之写信，明确指出，搞飞行集会，搞暴动，“这不是一个好办法”²。他还在苏准会秘书处发起了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签名运动”。其时在苏准会秘书处工作的胡毓秀回忆说，林育南在苏准会期间开展了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育南同志和我们谈话时，只要一提到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工作的危害，“就非常愤慨”。他告诉我们：“由于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党的许多优秀同志都成批成批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1930年冬，育南同志发起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签名运动，“我们也在那张白色的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何孟雄也是坚决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1930年9月8日，他起草了《政治意见书》，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林育南是何孟雄的有力支持者。李立三不仅没有接受何孟雄的批评，反而大搞惩办主义，给何孟雄扣上“右派”、“取消派暗探”、“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并撤销了他江苏省委后补委员的职务。林育南对李立三的这种做法极为气愤，更激发了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决心，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场斗争中。他一再向党中央反映意见，并向共产国际写信，严肃批评李立三脱离群众，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蛮干，实行冒险政策，到处搞暴动，“是泛暴动主义”³。

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会后，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继续进行。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何孟雄的政治意见书一般是正确的，并指出对何孟雄的处理“是很大的错误”，“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是抑制自我批评的家长制度与惩办制度的具体表现。”从而撤销了对何孟雄的处分。

以上这些，就是林育南第一封信中所指的“校务改革”之事。他对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对何孟雄平反显然是高兴的，所以信中写道：“这些时的生活，真是难写。因为校务改革的奋斗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才得到相当的成效。”信中还说明，他渴望苏区，要不是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他或许早已离开上海到苏区了。“倘若不是因为校务的关系我老早就要离开了，而且想飞快地离开”，正是这种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

通过大革命失败后的生死考验和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林育南的革命意志进一步得到磨练。他昔日的战友卢吉珊(即陆沉)大革命失败后当了可耻的叛徒。对此，林育南在信中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可耻呵，吉兄们竟已脱跑到暖阁里去了！”寥寥数字，入木三分地揭露

了叛徒的卑鄙灵魂。同时他也坚定地表示,“此后我更当造成‘山’一般的稳定,‘铁’一样的顽强!”并以“铁峦”自勉,用“铁峦”作为自己的笔名。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和革命决心,跃然纸上。这和跑到“暖阁”里的叛徒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

林育南和陆沉五四时期是互助社、共存社的成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入党,起步是同时的,但他们的归宿却绝然相反,这是多么的耐人寻味呵!

三

12月24日,林育南到达浙江衢州,下榻上营冯雨记饭店。这是党的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站,在这里写了第四封信,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复杂心情。

他渴望苏区的心更急切了:“我是极想很快的到达我的目的地,得个安身立命之所。”可是,他的心仍惦念着上海,惦念着“校务改革”:“最近校务改革的事你知道么?这一切都是我很关心的事,倘若你最近来信告我,那我在千里外的途中就不胜其慰快呵!”

林育南为什么仍惦念着“校务改革”?

这是由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中央,对于结束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执行“左”的政策本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全党同志本应在此基础上,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为克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困难而努力,以求革命事业的发展。但这时,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在党内活跃起来。他们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手里拿着“国际路线”的虎头牌,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全盘否定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给党造成了新的困难,其目的,就是要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

林育南对王明也不陌生。大革命初期,林育南在实际主持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部工作、从事领导湖北武汉青年运动时,王明是武汉一所中学的学联代表。在五卅运动中,王明表现积极,当年被中共湖北党组织推荐去苏联学习,林育南自然知道。王明在莫斯科的5年情况,林育南虽然不完全清楚,但是,王明在中山大学搞宗派主义的活动,林育南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中多少有些了解。王明回国后,不服从党组织的分配,特别是1930年1月在租界被捕后,为了活命,竟不惜暴露组织机关,造成恶劣的影响,这给林育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明,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抛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鼓吹一套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居然要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这怎么不使林育南担忧呢?他在去中央苏区前,就对王明的活动有所警惕,尖锐地指出,王明没有实际斗争经验,比李立三差得远,李立三领导过工人运动,王明行吗?王明上台,是要亡党的。“中国革命如果让王明这伙‘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来领导,前途将不堪设想。”^{1/2}

林育南在衢州停留几天,派人打探交通,积极准备从这里进入中央苏区,但因“路上不靖”而未能如愿。此时,蒋介石正纠集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通往江西的路均被封锁。林育南即于12月30日返回上海。这时,王明更加紧活动。林育南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投入反王明的战斗。这从第六封信看得很清楚。信中说:“现在校务很有新的发展,而有待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操纵和支持下,王明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林育南被剥夺了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第二天,他到张金保处了解到会议的情况后气愤地

说：“怎么开成这样的结果？真糟糕！”张金保无可奈何地回答：“会是开得窝囊，但有什么办法，他们是多数，我们是少数！”林育南接着说：“什么你们是少数，他们是多数，王明不是中央委员，根本就没有表决权，有什么资格争多数？”张金保恍然大悟：“哎呀，怎么搞的，当时我们都被气糊涂了，怎么没想起这个问题，真傻！”林育南望着这位由纺织工人成长起来的中央委员，语重心长地说：“金保呀，你是中央委员，受党和人民的重托，那个会怎么能这样开呢？”张金保对林育南的批评心悦诚服，急切地问：“现已铸成大错，怎么办？”林育南坚定地说：“会是开过了，但中国革命绝不能让王明糟蹋。我们要团结党内的同志，坚持斗争。”⁴

林育南旋即找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以及罗章龙等工会和江苏省委机关负责人开会，坚决反对王明上台。在他们的发动下，反对王明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林育南并作好了长期与王明斗争的准备，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场斗争。在1月10日写的第七封信中说：“我这些时真是忙呵？每天总要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距)我们的期望尚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

囿于党内反王明的势力越来越大，四中全会后不几天，由米夫出面召集了“反对派”的代表会议。罗章龙教授回忆，这次会议是在当时英租界沪西的一栋花园洋房开的，故称“花园会议”。米夫在会上说，王明是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路线。还说，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体现了国际路线。米夫本想通过这次会议说服“反对派”，但他的讲话不能折服人。“反对派”慷慨陈词，据理反驳，要求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利益为重，收回四中全会决议成命，定期召开党的七大或紧急会议，以解决党内争端。米夫理屈词穷，给与会者施加政治压力，说什么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共产国际，要给予纪律处分。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开除了林育南、何孟雄、罗章龙等的党籍(林、何等因不久被国民党逮捕而未作出书面决议)，还处分了一批“反对派”⁵。

这场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比起在阵地上向敌人开火还要残酷。第八封信正反映了这场斗争的残酷性：“我太忙了，几乎‘废寝忘餐’。敌人与朋友之分者‘几稀’，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阶级的生活’决定要我如此。”

林育南、何孟雄等没有被米夫、王明的残酷斗争所吓倒，他们一面向共产国际写信，要求撤换米夫，一面继续照常工作。

1月17日，正当林育南等7同志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继续研究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问题时，下午1点40分，由于交通唐禹叛变告密，突遭公共租界捕房探捕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组成的联合行动队包围，林育南等与会同志全部被捕。第九封信，是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务司令部看守所写的，报告了他们被捕的时间及近况：“兹接友函，谓贵同乡李君^A于十七日被累，二十三日转龙华司令部，现在生活平安，请勿念。”这封信，正是通过陆若冰转告党组织，党组织才知道林育南等被捕的具体情况。

林育南等在敌人的监狱中英勇不屈，2月7日夜，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四

党的地下工作性质，决定了林育南的工作地点及组织关系都是保密的。

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在繁华的英租界卡德路(现石门二路)

和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交叉口的—栋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房(现北京西路 690 号至 696 号)筹备和召开的。林育南化装成南洋华侨,与刚从济南第一监狱脱险来沪的张文秋同志结成假夫妻,夜以继日地在这里忘我工作。当时别说陆若冰不清楚,就连林育南的妻子李林贞也不知道。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先设在上海玉佛寺槟榔路(今安源路)附近的德馨里德馨小学内,后迁到上海愚园路庆云里 31 号(现 15 号)。为了掩护革命,林育南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实行“机关家庭化”。他和妻子李林贞是这家的户主。李圣悦(即李平心)和他的妻子胡毓秀与李林贞以姑嫂相称。家庭成员还有左翼作家的冯铿。秘书处的工作虽然十分繁重,但连林育南秘书长在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这 5 位。

个别“玩文学”的人不顾上述事实,为了将林育南“婚外恋”的故事编得完美,大谈林育南的两次婚姻如何不幸,于是出现了第三者陆若冰。还说陆若冰“与林育南在上海共事期间,常见他们夫妻吵架”,“陆若冰在上海期间,给林育南做助手”。还说,林育南给陆若冰的这些信,“使他们的感情升华了。他们都感到:两人志同道合,而且谁也离不开谁。”真是无稽之谈!

陆若冰在上海什么时候与林育南“共过事”,又是在什么时候“做过林育南的助手”?

早在 1979 年 8 月 13 日,笔者在北京访问林育南的战友张金保老人时,老人便说:“林育南是一位很正派的同志”^À。

党的领袖人物是人不是神,他们和常人一样,也有婚姻家庭的问题。纪实文学应该是以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的“纪实”为前提的文学,客观地描写他们生活的这一方面是可以的,但不能故意猎奇和渲染,更不能凭空杜撰。“纪实文学”的殿堂应该是神圣的,任何玷污这块圣地的垃圾,都必须清除干净。

注释:

¹ 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文件》,李立三:《政治报告》。转引自《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中国工人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第 525、528 页。

[°] ½ 1979 年 8 月 11 日访问吴化之同志记录。

» 胡毓秀:《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时期》,原件存中共一大纪念馆。

¼ ¿ 1978 年 7 月 31 日访问罗章龙教授记录。

¾ Á 1979 年 8 月 13 日访问张金保同志记录。

À 林育南当时化名李敬堂。

(本文作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9)